

時事週評

- 一、改組政府的意義何在？
- 二、斥民社黨得洋房美金說
- 三、希臘土耳其問題的善結
- 四、莫斯科會議的命運

給我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封信

現代國際法的蛻變

眼光要看遠點

「豪門資本」考

東歐的前途如何？（新共和週刊）

美國共和黨之好機會（華萊士作）

法國共產黨之潛勢力

蘇中解放區及其他（續七）

附錄

- 梁漱溟致民青兩黨公開信
- 張君勱覆梁漱溟函
- 梁漱溟致張君勱函
- 中國國際人權保障會致張君勱函
- 張君勱致上海市市長吳國楨函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字第二五九四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川東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七〇七號

日辰 錢公武 萬武 申銘 殺生譯 陳明譯 戒庵譯 還俗



再生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弄
樓三號九
每星逢六期出版
本期刊售五百元

魚小吃魚大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給我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封信

日辰

我不是個政治煽動者，而只是個多年來以大學講壇為崗位的窮書生，因此，你不必擔心這封信有什麼政治作用，倒是要請你不要因我的書生氣味而蔑視信裏的好意。論交情，我和你們的任何一位並不相識；論階級，你我也不相同；我之所以寫這封信，說得大一點是爲了國家，說得自私一點是爲了我們的共同利益。在目前的政治經濟條件之下，我們都是被極端階級壓迫着，而我們所應遵循的解放途徑，也祇有一條。

首先，你們應將你們的身份闡明一下，固然，這並非幾句話所能詮釋清楚。不過，簡略地說，所謂民族資產階級當然不是無產階級或小有產階級，同時也非指封建性的地主或有殖民地的買辦與官僚，而是指免除以上這幾種本質而以發展國民經濟爲任務的資產階級。就資產的形式來說，你們可分爲工業的，金融的和商業的幾種。

無論你們是屬於這其中的任何那一類型的資產階級，歷史所賦予給你們的任務是神聖的。翻開近代史，我們沒有看見一個不藉你們的力量而能近代化的國家，沒有你們不發達而能發達的國家。將國家從落後的封建階段提到現代的生活水準的又是你們，將人民從極低的生活水準提高到文明的生活水準的又是你們。揆諸歐西史實，你們的確有過無比偉大的貢獻。中國，即使是現階段的中國，也是沒有例外地深切地需要你們的。我們甚且可以說，你們的命運和近世中國的命運是一致的。我國之所以如此落後，人民生活水準所以如此低下，完全是你們沒有發展起來之故。百年來的中國歷史可算得十分慘痛，你們雖僅有約半個世紀的生命，但這段期間的困苦命運和中國的命運相一致。在此，我想對你們的生命史作一次簡略的憶述，這對於你們抉擇今後的道路，顯然必要。

你們事業的開端，其實是在一八〇五年以後。在這以前，雖有一八六一年在福州設立的機器製茶廠，一八六三年在上海設立的機器碾米廠和江南製造局，又有同治光緒年間成立的軍用工業，但這些都是官僚資本的嚆矢，和你們不相關。你們事業的開始是在日俄戰爭以後，那時有了相當積蓄的商人才開始投資於近代式的工業。在你們剛才出世的時，日子已經

不好過了，那時外界的壓迫已經在等候着你們。因那是鴉片戰爭結束後六十多年的事。我國在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和馬關條約之下，沿海各重要據點已開作商埠，關稅的藩籬完全破壞了，租界建立起來了，領事裁判權開始實施了。英國日本美國法國比利時瑞典挪威的大大小小的船隻遊來遊去，各式各樣的商品紛至沓來，整個中國市場泛濫着洋貨。跟着外國資本又侵入來了，一八六三年在上海成立的「大英瓦斯公司」，就是一例。以後，列強爲了進一步做生意，他們採取了三個步驟：第一，劃定了勢力範圍；德國首先佔領膠州灣，以山東做勢力範圍，法國租借廣州灣，以華南做根據地，英國租借威海衛和九龍半島，一方面和法國爭奪華南的勢力範圍，一方面和中國政府約定不得以長江流域割讓德國，美國分不到贛，便大嚷「門戶開放」。第二，爲了原料，他們分佔了贛山和開採權，又大量的投資於鐵路的建築。第三，除了贛山和鐵路後，又投資於各部門的生產事業。如：英日在華所設立的輪船公司，控制了中國的航業，在紡紗業中，英日又投有佔支配勢力的資本，在電氣業和烟草業中，英日美佔了一半以上的資本，此外，如電報電話航空麵粉製火柴印刷等業都有外國的投資。至於金融方面，則銀行之設，有如雨后春筍，所發鈔票，滿天亂飛。

外資因技術優良，且利用了我們廉價的原料和勞動力，故產品完全奪取了你們的市場。你們短促的生命幾乎給殺死了。到了一九一四年，你們的命運本來達到轉機，你們本來可以在那大戰期間的四年的歲月裏將身體調理一下，以準備應付來日的天難的事實。你們在國外工廠忙於製造軍火，外輪忙於運兵，以致對華輸出有了顯著減少這種千載一時的機會裏，着實的鬆了一口氣。因此，無論紡織絲綢麵粉電氣或火柴工業，都蒙上前所未有的景氣而蓬勃起來，資本增加了，規模擴大了，這些都有記錄可憑。不幸的是，這景氣曇花一現地隨着大戰的結束而消失了。

你們在這四年的黃金機會裏所以不能建立起來鞏固的基礎來，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是檢拾了戰爭便宜果實的日本，乘機擴大了對我國的經濟侵略。在大戰的四年中，日本在華紡織業的發展比你們還快，貿易方面，

她佔據了原屬於英國的第一把交椅，她又幾乎獨佔了對華的鐵路投資，在華的八家外國銀行中，她佔了五家。如此看來，大戰期間外國經濟勢力並未退出，只是相對的減少而已，所以你們還不能自由的發展起來。其次，是我國政治局面的紛亂和北方政府統治的腐敗。在這樣的政治條件之下，政府的財政是依靠借債度日，且根本無經濟政策可言，政府固不會實施保護政策或其他獎勵辦法，而你們想從事有計劃的生產，當不易易。

於是，大戰告終，列強回頭東顧，你們又開始度艱難的歲月。戰後，德俄兩國的勢力，雖然退出，但英美日三國的經濟魔手伸得更入。開始，他們的生產數字還有若干的增加，後來便每况愈下。從第一次大戰結束直至抗戰前夕，在這一段漫長的日子內，我們所見到的就是外國在華資本的急速發展，和列強競爭着對我國的搶掠。最初，我們看見在金融方面，英國搶了首席，日本在貿易方面和工業方面，排斥了英美而佔第一位。其後，「九一八」事變發生，英美在東北的勢力，遂告撤退，英國為挽回頹勢，援助中國改革幣制，將法幣拉入英鎊集團，我們在經濟上於是做了約翰牛的尾巴。美國急起直追，控制了我們的航空事業，大量的輸入車輛和汽油，又設法將法幣從英鎊集團拉出來放入美元的懷抱，這樣，我們又改嫁給山姆叔叔。德國不甘寂寞，大量投資於玉萍及湘黔兩鐵路，德國漢沙公司又幫同建立歐亞航空公司。

所有這些列強對我的角逐，無不以你們做犧牲。於是你們一天天憔悴下去了。冶煉工業方面，如龍煙公司，漢冶萍公司，安豫公司及興鋼鐵廠，先後停止生產，開平煤礦只有依附在英國資本的開灤煤礦局之下。較有基礎的輕工業，也凋敝不堪。華北的裕元北洋等紗廠和上海的申新五廠，都給日本人買去了。沒有出賣的紗廠也縮小了規模，如一九三三年華商紗廠本佔百分之五七·一，到了一九三六年，減到百分之五六·八二，線錠從一九三三年的百分之三三·二五，減至一九三六年的百分之三二·五三，布機從百分之四八·二三減至百分之四七·九五。至蠶絲業的情形更不堪聞，一九三〇年華商繅絲廠有一〇七家，車數有二萬五千三百九十五部，到了一九三五年，廠數減至三十三家，車數減至七五六百九十部。比較最興盛的是火柴工業，也要和日人資本合作，成立全國火柴聯合社。最可悲的是你們中竟有一部分人以推銷外貨為職責，使你們的招牌上蒙了買辦

的糞污。

總之，在這二十年的時間裏，你們只能檢拾外資外貨所遺留下的冷飯殘羹，在列強白熱的角逐的夾縫中討生活。但你們的惡運並不止於此。

抗戰的炮聲響了，你們集中的生存了數十年的沿海城市，隨之而失，首當其禍的就是你們。根據已知的統計，紡織業方面，九十六家的華商紗廠中損失了六十家，那紗錠損失了二百萬枚，布機損失了百分之七十。麵粉業方面，工廠損失數字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產粉量損失在百分之六十以上。火柴業損失了百分之五十三。蠶絲業損失了百分之五十。造紙業損失了百分之八十四。鹽酸業損失了百分之八十。製鐵業損失了百分之八十二。根據官方的公佈，上海被毀工廠為二千三百七十五家，資金損失五萬萬元。在經濟部註冊的上海以外的工廠，被毀的有一千四百六十五家，資金損失二萬萬四千元，合計全國被毀工廠數為三千八百四十家，損失資金七萬萬四千元。根據中央工廠檢查處的統計，各省市的工廠總數為六千三百四十四家，如果這一數字是正確的語，那麼，被毀的工廠當佔全數的百分之六十了。這只是指被毀工廠而言，如加上被敵人劫奪了的來計，則你們的損失，可算十分沉重。

不過在京滬錢一帶的工廠有二百餘家曾西遷四川，直至二十八年年底，內遷工廠共四百一十家。你們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和沉着奮鬥的精神完全贏得我們的同情和欽佩。之前，你們在機器缺乏技工缺乏資金短絀和敵機不斷轟炸的幾重困難和威脅之下，仍能理頭苦幹，力圖發展，盡了你們對抗戰應負的責任。自民二八年起，你們有過兩年的景氣，無是在領導抗戰的陪都或敵後孤島的上海租界，各業都獲得鉅大的利潤，而且在技術上你們有了顯著的進步。以前產量很小的物品，固可大量生產。即以目前必須仰給外國的東西，也能自己製造。據官方統計，自民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大後方新設工廠約三千七百零一，資本額為二十萬萬元。你們得以享受這期間的繁榮，理由十分簡單：一方面，生產經過極度破壞後，商品的供應自然減少，另一方面，戰爭擴大了需要，因此物價提高，利潤增加，生產規模擴大和技術進步。使各生產部門呈現了欣欣向榮的景氣現象。二十九年秋，景氣趨色了，小規模的機器廠關閉了，商業蕭條了。據重慶煉鐵工廠每天出產的二十噸鋼都找不到主顧。根據四川省府的統計，四川省內鐵

都起了大變化，如日本在華資本誇台了，大後方的封鎖解除了，一切似乎都較前活躍和有前途。可是，展望你們的前途，却看不出有一點光明。首先，內戰依然繼續和擴大，因此破壞生產的惡性通貨膨脹，還未停止，不但未停止，且較前變本加厲。其次，部份的外資於戰後退出了，但跟隨進來的是更兇的實貨與美資。美國的獨佔資本，有最新式的生產技術，有最靈活的交通工具，加上我們低價的外匯率，在中美商約的遮護下，必然使美貨大量的滲入我國市場，而排下了你們的產品。而其雄厚的資本也必然地和我們的官僚資本相勾結，進而控制了各種生產部門，使你們毫無插足餘地。第三，官僚資本在美資的支持下急遽的發展起來。官僚資本原來已擁有最強大的金融機構，在抗戰的幾年中，又將所有重工業如兵工廠發電廠煤礦鋼鐵廠，都放在資源委員會工礦管理處燃料管理處及兵工署的管制下。後來，又成立了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中國蠶絲公司，中國石油公司（已撤銷），中國糧食公司和由中央大員及各省顯要與美資合股集資數十億的中國實業公司。這樣，全國的主要生產部門便緊握在官僚資本的手中。此外，他們還積極地破壞民營事業，如去年大華航空公司執照的被吊銷，又如民生公司的被歧視，可為例證。我們知道，招商局和民生公司是我國的國營民營兩大輪船公司。在抗戰期間，它們都受了極大的損失，但戰後它們所受政府的待遇，却有天壤之別。招商局在敵偽物資項下接收了一千二百多艘船隻，和附屬的碼頭棧房等設備，政府又撥巨資自外國為它購買船隻，此外，既可得免稅捐稅，獲得銀行貸款等優待，對於軍運的負擔，又較輕微。而民生公司所受優待既遠不及前者，反而負擔了軍運的重任，致所有輪隻，十九被徵。所以抗戰儘管已經勝利，但放在你們支離破碎駁對不堪的身上的壓迫，反較前沉重。難怪在抗戰勝利的時候，你們却紛紛失敗了。上述那一度的密勒氏評論報給我們的報導是：「貴陽有一千家工廠破產，同時在昆明有半數以上的工廠已經倒閉。」

關於你們悲慘的過去，你們比我們任何人都了解，現在由一個書生來訴說，這對於你們難免覺得有隔靴搔癢之感。不過，從這一番追述中我們或可得到這樣的暗示，你們過去如此的遭遇雖由於客觀條件所做成，但在主觀方面，你們的鬥爭還沒有達到應有的程度。過去，一般來說，你們只

是波波於應付當前的局面，圖自己的生存，及希望環境的好轉。你們忽略了一個道理：資產階級是注定了在社會新舊交替的混亂的時候產生出來，而它的任務是以自己的力量打開一條出路，創造一個適於自己生存和發展的環境。所以，你們儘管等待環境好轉，而好的環境至今沒有出現。當然，我們不能抹煞你們以前企圖創造新環境而作的努力，你們在辛亥革命北伐和抗戰幾個時期中，曾給予革命力量以巨大的支援，但你們只是從旁協助而沒有挺身出來領導鬥爭，也是事實。所以你們至今還不能出頭。在此，我們試拿先進國家資產階級革命的成例來說明罷。

歷史告訴我們，世界上最先成功的民主革命是由荷蘭的資產階級領導完成的。荷蘭的民主革命，爆發於十六世紀。其時荷蘭工商業的發展為全歐之冠，所以作為資產階級前身的商業資本家有了巨額的積蓄。同時，農村經濟破產，使農民大量流入城市，構成巨大的勞動力量。因此，當時荷蘭發生資本主義的條件是成熟了的。可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遭遇封建勢力的頑強阻礙，這是一種矛盾促成了荷蘭的民主革命，推翻了腓力第二的封建統治。這次革命運動，表面上雖由被腓力第二壓迫因此起而反抗的貴族所領導，但實際的領導權握在荷蘭的資產階級手中。革命的結果是：民權政治的原則確立起來，貴族經濟和行會制度皆被推翻，荷蘭的資本主義得以順利發展，荷蘭，尤其是阿姆斯特丹成為當時的國際商業中心，戰勝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獲得許多殖民地。國家的榮譽和資產階級的無窮的利益，都是荷蘭的資產階級自己贏得的。

荷蘭革命成功後一世紀，英國的資產階級領導成功了世界第二次民主革命。這次革命無論在成就方面或影響方面，都超過了荷蘭的民主革命。它不特保證了英國資本主義的順遂發展，而且給他國的資產階級以良好的榜樣。英國的革命當然也是因資產階級正欲向前發展的時候，遭遇封建勢力的阻撓和迫害而起的。這新舊勢力的矛盾終於在十七世紀爆發的革命中獲得解決。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本來英國在十三世紀時即有國會之設，而下院是代表市民的（即後來的資產階級）的利益。由十三世紀起到十七世紀中頁，國王和國會間的衝突，已層出不窮。到一六二九年查理士第一因國會提出「權利請願書」而將國會解散，政治更趨於專制，經濟上又給予資產階級的發展以更大的妨礙，資產階級不能忍耐了，革命於是爆發。（未完）

現代國際法的蛻變

(一) 國際法的變貌

自從在倫敦及柏林的圖書館中發現了古時埃及一種紀錄文件之後(註一)，一向被學者們所認為人類商業關係的發展，乃國際法起源之主因遂被打破。在太古最早的一次國際條約中所表現的，就是為實現和平而使埃及在公元前二七八年在對赫底說(Hettite)戰後所訂立的友好與攻守同盟(註二)，而且在那個攻守同盟中，不僅雙方合作對付外來的敵人，亦且互相一致撲滅國內的叛亂。這個發現，毫無疑義地，使現代的學者，重新替國際法下定義的時候，就不會再把國際法當做各國以法律規則來維護和平與促進商業的工具了。國際法顯然是社會實際的人羣中，根據一項客觀事實需要而產生的社會規範之一，正和過去埃及與赫底說為避免相互戰爭而同時被削弱其國力的感覺，而以集體的體的安全為其唯一目的。這種集體建立和平的需要，便是國際法自動產生的真正原因。

由於這個真理的發現，所以近代國際法的權威，莫斯科大學教授柯勞文(Eugene A. Korovin)在論到二次大戰與國際法的關係(註三)時，就把國際法界說為對保護民主最低限度的一種國際保障的全部法律規範。而像著名的社會法學者，日內瓦大學法學教授賽爾(Georges Scelle)，則更認國際法是一種社會實際的法律，對各個社會(包括國家)的法律具有超越性(註四)。同時，現代的外交家如英外相貝文，也不免希望國際法能成爲一種世界法，而以世界全體的主權，來代替舊國家的主權(註五)。跟隨着這種國際法在事實上的演變，前任英外相艾登，早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向下院辯論中，即已指明自從原子彈發明以後，除了各國排斥現時主權觀念之外，恐不能使世界在原子能威力中獲取安全保障(註六)。這種拒絕國家主權的傾向，我們很明顯地已在聯合國憲章中，見到初次的反射。聯合國不像過去的國聯，第一，它已規定了大會三分之二的表決方法；而在安理會中更確定了大國的特殊權利(註七)。第二，制奪國家在自衛或實用集體武力以外的宣戰權利。

錢公武

國際法近代的演進，正如柯勞文教授所說，其目的在克服反民主潮流與封建的，帝國主義的法西斯殘餘，故在擴大國家的主權原則之同時，已透露出人類為達到其共同生存與進化的曙光，換句話說，國際法已與人類共生的目的相化合了：國際法的原則與規律，就是人類共生的原則與規律。因此，著名的史托威爾教授(Elliery G. Stowell)，也曾一度對國際法認為包括舉世承認的人類關係上某部規則，在各個人類集團間，由各該政府機關所施行(註八)。同時在聯合國憲章的序文中，我們也可窺見近代的國際條約，其威力將更重大，差不多人類共同生活中一切的關係，都能以條約或協定的方式來表達。因此國際法協定法的基礎，自憲章有明白的規定後，更將日漸增強。而世界經戰後的變革，國際法在這種激成的新形勢中，當然決非過去我們所講的國際法所可比擬。我國經此戰後，百端待舉，既以內部糾紛未已，影響對外關係，但弱國之興必有賴於外交，故對於國際法之變貌，自不得不首加注意，特按平日研究所得略行一二，以供海內學者參考。

(註)一、參閱V. P. Potemkin主編之外交史卷一第一章。Potemkin為蘇聯近代著名歷史學家之，該書為莫斯科國立社會經濟出版社一九四一年出版。

(註)二、同前，該書為埃及法皇萊不雪斯第二(Ramesses II)與赫底國皇哈都爾第三(Hatchepsut)所締結，內容包括三部：(一)序言，(二)條款，(三)結尾(向上宣誓書或不破壞約文)。

(註)三、柯氏除任莫斯科大學教授外，更兼任蘇聯司法部所設司法學院教授，最近在美國「國際公法評論」(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號，曾發表一文論二次大戰及國際法。

(註)四、參閱賽氏所著：「天下法原論」(Precis De Droit Pénal)。

(註)五、見國際公法評論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號柯氏論文所引。

(註)六、同前。

(註)七、據柯氏的意見，所謂大國的特殊權利，並非其各個的權利，乃是大國在全體國際團體利益中所具有的地位，因為這樣，大國所負的國際義務也特別重大。

(註)八、參閱史氏所著「國際法」第十頁。

(二) 主權的消滅與中立

因了國際法的現代意義，由於聯合國憲章的暗示，國家主權之漸失實效，今已成爲昭然的事實。儘管一般國家主義派的學者，像著名的法國尼傑耶(J. P. Niboye)在其一九四四年出版的法國國際私法第三卷上，仍舊對其同僚畢耶(Pillet)的超越國界的理論加以駁斥(註一)，但以此次對戰犯個別的懲罰，以及波茨坦宣言中關於德國權利對私人財產之措置(註二)，毫無疑義地證實了國際法確有以個人爲權利主體的趨勢。本來，關於國際法上的權利主體一說，在二次大戰之前，早已引起各學者的激烈辯論，如社會法學派的各項見解，都主張國家不能做成國際法的權利主體，因此很多學者們對於「國際法」這個名辭，也都感到有正名之必要(註三)。我們只要對羅馬法上所稱的*Jus Gentium*，就可知道近代法學國學者大都把國際法一字，改成天下法(或萬民法)——*Droit Des Gens*——自然也不無理由。在國際法形成天下法，或如貝文所說的世界法階段中，國際法的權利主體當然將逐漸由國家移於各國持有國際法上法權的個人，這些個人便是政府人員及統治者(註四)。國家主權一說，我們除於發展的近代憲法意義外，在國際法上也同樣地到了日暮途窮的時候。雖然在現代的蘇聯法學家，仍舊還不能完全理解國家主權的必須消滅(註五)，但由是所發達出的「否決權」思想，在今日我們已誰也可以見其足以如何地損傷國際法健全發展的前途了。

國家主權在現代國際法意義中的消失，我們也可從另外幾件事實上指出來。譬如說吧，中立的意義雖於一九四六年重寫一九二八年的哈伐那公約(Convention of Havana)時沒有被廢止，可是事實上在容忍國際干涉的今天，任何國家已無中立的可能。此在四百來年世界所建築出來的一個神聖原則，在最近二三十年的國際變化中已完全被證實爲兩次的戰爭所擊潰了！甚至如柯勞文教授還說，中立不僅可於戰事中被破壞(如此次大戰中之丹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挪威等)，抑且足以助張侵略的氣焰而被視作一種掩護(如西班牙)，這個理由，我們如證以最近的時事發展，確有相當的價值，即如瑞士亦且不能逃過此次戰時盟國的視線，在瑞的一切德國財產均遭沒收(註六)。從這一點看起來，所謂中立的不能被保全

，不完全爲了侵略的緣故，在反侵略的一方面看起來，也同樣有其必要。所以，我們如細細檢讀聯合國的憲章，很清楚地，除了在未來戰爭中只有在二非會員國發生戰爭而聯合國不加以過問時，任何國的中立始能獲得保障，否則絕對不能有中立的餘地，顯然，這個時代已不是保障中立的巴黎宣言時代了！何況今日的世界，不要說兩國間的戰事，必然會引起聯合國的干涉(即使雙方都不是會員國)，就是一國的內戰，也可能是世界大戰的前奏，我們只要對戰前西班牙的內戰一加檢閱，即可恍然。

國際間中立狀態的不易存在，勢必引起國際法上一大劇變，即完全抹殺一國國家主權的國際普通干涉是。國際的普通干涉(Universal Intervention)，固然在兩次大戰所結成的反侵略陣綫的一事實可以獲得左證，就是在此次戰後盟國駐軍海外，甚且干涉內政(選舉)的一事上看，也何嘗不能透露出此種干涉的未來發展。譬如說吧，今日聯合國派員調查希臘對阿保南三國的邊境糾紛，美國對我國的調查，在足以顯出世界確然在走向「天下一家」的方向了。如果我們站在國際法維護和平的立場上，此項普通的干涉實即達到和平的具體方法。在此一影響之下，國際間久所堅持的平等合作原則，自然有一天會代以隸屬與不平等的原則。這就是說，普通干涉可能使國際間放棄平等協同，而完全變爲強國的權力統治。所以有人說(註七)：聯合國憲章在序言中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已被破壞。其實這種現象，乃是目前滯留於不徹底世界組織所引起的顧慮，如果一旦國際法成爲世界法，此種普通干涉即爲法律的唯一制裁工具。但無論如何，國家主權在今日的國際法上已無其存在的餘地了。

(註)一、參閱尼氏所著：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e Fran Cai Tome 3; Conflicte De Lois. D'autorites Et De Juridictions Paris-s. Sirey 1944 P.799

(註)二、參閱：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43 July P 622

(註)三、參閱 G.Salle, Précis De Droit De Sues Ch. I. Crowell, In- functional Law P.9 Footnotes.

(註)四、此處暫擬按我附錄的說法。

(註)五、柯勞文在二次大戰與國際法一文中(見上)，指柏林會議及一九四五年六月五日盟軍總司令會議之議決，爲限制德日二國之主權，乃爲限制侵略國之主權，而此即增強愛和平國之主權。

(註)六、參閱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43 July P 62 Footnotes.

(註)七、參閱同上六三一頁。

(三) 戰爭新意義所引起的問題

經典的國際法學者，他們一向把國際法分成和平法，戰爭法及中立法，此種分類今日當然也失其意義。不僅中立已不能存在，一如上述，即以戰爭而論也不能成爲國際法的一部分。聯合國憲章業已規定了國際間和平解決爭端的義務，在國際關係中，除了個別或集體自衛之外，不許會員國引援武力，而同時則制定了以安理會之決議，結成集體武力以恢復世界的和平(註一)。尤其顯明的，便是在首次大戰後爲一般法學者所理想的國際警察行爲，今已首告實現；而在昔凡爾賽和約上未得對德國戰犯作必然的處罰者，今日紐倫堡的顯示當然已使國際法前進了一步。我們今日較諸非戰約時代所不同者，即不僅在法律上視戰爭爲非法，且更具體地提供其和平解決爭端的方案。而且即使爲了各國或集體的自衛，也須首先提請安理會採取必要步驟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這樣，不啻對過去全部戰爭法的理論，一概推翻。

今後的世界，雖只許在安理會及其軍團合作之下，始得引用集體的武力，而此種武力便成爲國際的警察力量(註二)。然而同時這也就說明，國際間尚非絕對廢止戰爭，而此種和平的維持自然還得依恃各國的外交政策，是否能繼續基於民主原則之上。因爲，近代的政治的外交家，大都還怕會有一天，使蘇聯爲了憲章條款的濫用，甚至在正式票決的程序上，迫其退盟(註三)。今日雖已不會再如過去的一般，對戰爭有合法的或正義的感覺，但蘇聯的一般法學者(註四)，顯然還重視人民爲祖國發動的愛國戰爭，他們迄今猶在堅持游擊隊雖非國家武力，但爲人民的，所以不論在對外或對內的戰爭上，他們仍能被視爲一種作戰團體，且對其俘虜應視作戰俘。蘇聯學術院法律研究所會員特拉意博博士(J. P. Trainin)，甚且把游擊隊員的範圍擴大至一般非持武器的政治工作人員，並引據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款，所謂聯合國會員國在安理會採取必要步驟前，也並不損害個別的或集體的固有自衛權利(註五)。特氏更指爲，這項自衛權利也包括敵後的人民游擊武力。但對這點，他又認爲如果今日德國的地下活動一旦發展成遊擊活動時，因其並非一正義的民族戰爭，所以便不能認爲正義的遊擊活動，而取得作戰團體的地位。蘇聯這些現代的

國際法理論，顯然和法國的尼堡耶一般，還深刻地戴着一付國家主義的眼鏡，這些理論實在有阻礙國際法發展的可能。

戰爭如果還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別，這便墮入於過去一樣的错误，把戰爭視爲合法，這種理論在現代已不能與聯合國憲章的精神相符合了。同時由於這樣理論的發展，我們深深地可以感到，波茨坦宣言關於德國賠償所作的規定，對私人與國家的財產概無分別都視爲戰利品，顯然是很難和現代國際法的潮流相迎合的。英美兩國爲了自己國家一時的私利，竟然同意了蘇聯當時的要求，也難怪對我東北工業資材之被劫，也弄到毫無辦法制止了。其實現代的國際法既不能視國家爲其權利主體，對於戰敗國的人民權利自不能一概無別地全部漠視。

隨着新時代的戰爭意義，我們又見在國際法上所謂國家的承認一問題，也發生變遷。在這次戰爭過程中，我們時時見到對某國的不承認問題，如目前聯合國對西班牙，即是一件佳例。此項不承認政策，往往並不能使事實有何改變，因此發生了一個事實的承認問題。再如戰後盟國不僅駐軍敵國，且亦駐軍於盟國：如蘇聯駐軍東歐各國，英美之駐軍於中希。以及戰後的移民問題，使今日的巴勒斯坦即受猶太移民之影響成爲未來戰亂源泉之一等等，都是迄未能在新的國際法中形成實際的具體的一般原則。就是對中立一問題，也還在國際法學者們討論之列。他如敵對性的報復，在戰爭在非法的場合，將如何重作檢討；一國領土的修改，是否也應在新的國際法中，被法典化所形成一個新的原則，這都是急待解決的問題。國際法典編纂會議，自一九三〇年舉行以來，雖僅有微弱的成功，但今後在聯合國大會主持此項工作之下，我們希望能有滿意的成績。

(註)一、參閱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九條至五十一條。

(註)二、參閱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一九四六年七月號 所載 Edwin Borahard The Effect of War 一文。

(註)三、參閱同上社論 (Clyde Easton 著)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Iouer Dispute" 一文。

(註)四、參閱同上 Trainin Question of Duerill Warfa in The Law of War 一文。

(註)五、同上。

眼光要看遠點

萬武

三十二年梧州尚未淪陷，我由新興視察歸來，正適廣西銀行舉行紀念會，請我演講。我演詞中有一段話說：「最後勝利是一定等待得到的，不過等待勝利以後，國人不改變作風，貪污的仍舊貪污，發財的仍舊發財，那麼其結果只有等待着推打。」果然，美國的兩顆原子彈，蘇聯的對東四省的出兵，遂達到了最後勝利的目的。但是勝利確是勝利了，我國家也一躍而為四強之一了。如果有人肯拿起鏡子，自照一照，到底像不像一個強國的國民呢？果能以弄假成真，可惜一般的貪污者都於是發了國難財，以後繼續又發接收財清查財，……財，你說痛心不痛心呢？現在我敢說等待着推打的機會，馬上就要降臨了，如若不信，請言其故。

日前報載，日本首相不是已呼出了反共反蘇的口號，以討好美國了嗎？以一個戰敗國家，居然放在共管制之下，大膽的發此狂言，

不能不說是有後台老板的主使。退一步來說，也是仰體憲意先意承志，對契爺表示孝順。照此情況演變下去，我們將來難免不有將中國交與日本代管以資熟手的一天。我這話，並非是危言聳聽，我更不願不幸而言中。復次，現在國共兩黨的大錯誤，就是雙方自命為死硬派的人們，一方主張美國應該立即拿出原子彈來壓迫蘇聯，然後國民黨才可以消滅共產黨，一方又想蘇聯出頭撐腰，以打倒國民黨。其實，雙方都是大錯特錯。須知到了現在人與人之間尚無信義之可言，何況國與國之間呢？當蘇聯單獨支撐中國的時候，美國還不斷的大賣其油鐵與日本，如果日本人不太瘋狂，沒有珍珠港的事件，我敢斷言美國決不會參戰，假如日本人高明的話，實行中日親善，事事給老大哥留一點面子，現今最少也是亞州的盟主。我竊料美國的恐蘇病不去的話，德日兩國可能在最短期間抬頭。

我直不懂隔壁的對門的都在合而謀我的時

節，我們兄弟們尚記着你打了我一拳我罵你一句的仇恨，大打其全武行。強盜們正在商量你分那一張凳子他分那一件衣服，我們不謀自衛，只是叫書房中的小孩子放下書本，在牆上寫幾個公仔，表示反對，有用嗎？

現在世界的衝突，只有兩種：①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②民主與獨裁。自德日失敗後，雖然有少數國家，飽嘗獨裁滋味，不大贊成民主，但獨裁終要消滅的。至若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在目前尚難免不有衝突。但就現今最以資本主義著名的美國而論，他又何曾不顧及到社會的不安，以及經濟的不民主？蘇聯雖以實行社會革命相號召，但是到了現在，他又不能不承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總之，絕對的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是行不通的，我想雙方到了多碰了幾次壁的時候，自然會回頭，而走上述調共存的路。

總而言之，求人不如求己，我們趕緊站起來，各人檢討自己，改頭換面，堂堂的做一個人，把眼光放遠一點，不要等着推打。替老百姓打算，就是替自己兒孫打算。是時候了！老爺們醒醒吧！

「豪門資本」考

• 申銘 •

傅孟真先生，怒斥孔宋，指為「豪門資本」。這一名詞，確是傅先生的創作，而時下的引用，也就家傳戶誦，慨乎言之，我們自有同感。不過他說：他的朋友某教授，在抗戰時期，創「官僚資本」之詞，這有些寂寞。我知道：陶希聖教授，在民國十九年二月新生命雜誌中，寫的「中國之

商人資本及地主與農民」一文中，已有一節「官僚資本之出口」。又於民國十八年日本人在大連中日文化協會發行的滿蒙月刊第十一年第十二號「重稅政策與社會生產之因果關係」一文中，也有「大地主由地租所得之資本與「官僚資本」，大部流入大都市」的話，可知「官僚資本」之一詞，並非源起於抗戰之時，但在抗戰期間，官僚資本，為患更烈，勝利之後，誠如傅先生所言，「大魚吃小魚」，又改編成錢家「豪門資本」罷了。

東歐的前途如何？

美新共和週刊
毅生譯

如果我們欲完全瞭解蘇聯，我們必須要解決兩個地區的問題，一是德國，一是東歐。最近召開的莫斯科會議，是用以解決德國問題，但似乎不會解決德國的東面和東南面的問題。

有人認為，波蘭，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阿爾比尼亞，保加利亞等國的問題是早已解決了，換句話說，他們已經入了蘇聯的範圍。從政治上說，無疑的，蘇聯現在統治這些國家，從經濟上說，東歐與蘇聯正在形成一個集團，排擠西方。

因之遂有人認為西方是「失去了」東歐，這樣的劃分不管將兩世界間的最後的經濟政治於疆界，更向西移。其實這種議論忽視了以下的事實，就是東歐的新政權所爭取的第一件事，是恢復他們的破爛的經濟，以及從納粹滲入和崩潰的真空之中創立起一個新的國族的和區域的機構。因為他們的工業顯為落後，並缺乏許多基本的天然資源，所以他們欲求生存，惟有對外貿易，換句話說，必須與西方及東方做生意。他們為使能夠立足起見，必須要得到西方和蘇聯的經濟幫助。西方如果關閉經濟合作之門，則他們惟有更依靠蘇聯。

這些認為「失去了」東歐的人，根據了以下兩個理由：第一是兩邊貿易的優勢（指對蘇貿易），第二與蘇聯的經濟合作，例如匈牙利與羅馬

尼亞簽訂的商約。

但是關於東歐的貿易，我們不可忽略以下一個主要的事實，就是建立在一個應急的基礎上。波蘭與蘇聯兩國之間的商約，其意義是兩國在經濟上互相關連結起來了。但是所有歐洲國家，在這個物資缺乏的時代中，能够有所貢獻的，都已經彼此簽訂商約，而最成功的國家是那些有主要東西的，例如丹麥的牛油，波蘭的煤，羅馬尼亞的石油，法國的毛線，俄國的棉花。戰爭所帶來的通貨，飢荒，黃金缺乏，以及高度不穩定的通貨，使大部歐洲國家不得不在變邊商約與根本不訂之間選擇其一。

當捷克與巴西簽訂一張商約之時，並不成為一條新聞。但當捷克與蘇聯簽訂一張商約之時，美國報紙就叫道捷克投入了赤俄的經濟集團。

戰後，大部東歐的商業是與蘇聯發生關係，這是事實。一九四五年，除聯合國救濟署後總署的船隻以外，差不多全部商業向東流，但與戰前比較起來還不足道，到一九四三年，東歐商業逐漸衰微，不僅東歐國家之間，並且與西歐。

試以煤為例，就可見出目前緊急狀態對東歐商業的決定性為如何了。去年波蘭在其全部出產的一千二百萬噸煤之中，輸給蘇聯七百萬噸。但蘇聯本身存煤很多，而在戰前亦是一個輸出煤的國家。現在波蘭希望美國借款，使她能够增加煤的生產，就是於一九四九年可以輸出三千五百萬噸。他的市場可以又朝向北歐，東歐和中歐，而不同蘇聯。

（未完）

馬克思做的資本論，是針對西歐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形態而論的，輸入中國以來，在這半封建

次殖民地社會當中，形形色色，各呈奇觀，請看：（一）商業資本對金融資本，（二）民族資本對買辦資本，（三）國家資本對國際資本，（四）生產資本對投機資本，（五）官僚資本對豪門資本。在現中國社會當中，後者總是抵擋不過前者，後者不是前者的敵手，這是中國人的悲哀。商業資本本來應該是民族資本，進而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要遵守國家經濟政策而為生產資本，不要為一黨財政政策而做破產資本；可是廿年來，國事日非不從人願，商業資本，隸從金融資本，金融資本（自然是中國人的金融資本），又與買辦資本勾結，向國際資本投降，變為破產的投機資本。投機資本又大多數由在朝在野的官兒們操縱為之，故人呼之謂「官僚資本」，大魚吃小魚，地方官僚，中小官僚，又盡為幾大家豪門所俘虜。所以連傅孟真先生也悍然不顧地揭發豪門資本的橫行，誰曰不宜！

中國社會的經濟性資，由秦漢以來，已經不是純粹的封建社會，商業資本業已開始，到唐宋幾代，早有過福國殃民的豪門資本了。

封建社會，須有封建領主，封建領主，直接操縱經濟，有賦予授受之權，才是真正的封建社會。秦漢以來，私人兼併土地，江南的手工商業發達，商業資本家與封建領主分立（即商人與地主之分化）。地主固可為官之後補，而官亦可為商之支援；但都不如秦前封建領主之直接授受，而是買賣的，也是兩千年來我們中國「升官發財」思想的由來！（下接第十五頁）

美國共和黨之好機會

華萊士作
陳明譯

共和黨若能不獨在今年或明年，而且在以後多年中給予我們以和平與繁榮，則共和黨值得無限期的為在朝政黨，因為人民之福利，比任何政黨權利更為重要。因此，我冒犯被民主黨議會之危險，特向共和黨作若干提議，共和黨若能接受，必可給予美國以康寧之繁榮，及世界得享永久和平。

第一，共和黨總部需要無政黨色彩之經濟指導，俾使其最能為國家服務，故此最好能得總統經濟顧問會議之指導，因此會議有商務部，勞工部，農業部，內政部及財政部之最基本的情報及統計。

第二，與各國訂立商務協定之計劃，必須竭力加以推行。共和黨倘放棄其對於關稅之傳統態度，則其對國家貢獻甚大，且國人對其不勝感激。

現在我要敘述喬治·羅拔斯 (George Robo) 之故事。他是十九世紀末期依奧華洲 (Iowa) 一個小城之新聞記者，因堅決反對提倡紙幣本位之該尼，哈威 (Coin Harvey) 的計劃，而為金本位辯護，當時麥堅尼 (McKinley) 總統委他為造幣廠長。以後羅拔斯由華盛頓轉紐約去了，在華爾街銀行界服務，為花旗銀行寫了好幾年通訊。我的祖父與羅拔斯認識，堅持我一定要讀他所寫的銀行通訊。由一九一九年開始，羅拔斯反覆發揮「第一次歐戰使美國成為債權國，吾

人須做到黃金之輸入超過輸出」之意見。

共和黨於一九二一年執政時，其施行之政策適與羅拔斯相反，即是提高關稅。美國每年貸出五千萬至一萬萬元，表面看來無多大害處；但美國在一九三〇年再度提高關稅，並停止貸款時，國際間感受重大影響，因而失業問題使德國得有藉口，在困境之中，希特拉登台了。

我明瞭上述之事情，乃於一九三〇到花旗銀行去訪羅拔斯，我對他說：「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你曾是一個很好的共和黨員，你為何不制止共和黨之瘋狂的關稅政策呢？」他答道，當時他確曾數度拜訪華盛頓的高級領袖，但他們對他說，政治局勢使他們提高關稅。

在今日，許多種物品之價格開始跌落，尤其是農產品如此。若論「醫治美國之藥品，最好是關稅」，此語暫時可得很大的政治利益。但國會內之議員，不論其為民主黨或共和黨，若贊成此語，無異於一個庸醫，其惟一醫治病人之方法是用麻醉劑。第一次歐戰以後，共和黨以關稅政策為醫治美國臨時之方，但藥品功效消失時，美國便陷於經濟崩潰。共和黨失勢十四年，此為其重要理由之一。倘共和黨以一九四七年及一九四八年物價行將跌落為藉口，而提高關稅，則其必將再行失勢，惟與上次不同之處，僅在乎其效果不持久而已。此章凡登堡 (Vandenberg) 與塔虎脫

(Taft) 知之最明。為國家之原故，我希望他們縱然在物價跌落之後，仍有勇氣照我的辦法去做。在此方面而論，尼巴拉斯卡 (Nebraska) 州議員畢特拉 (Butler)，俄言俄 (Ohio) 州議員真乾斯 (Jenkins)，紐約州議員李德 (Reed)，加拉福尼亞州議員紀爾哈特 (Gearhart)，明尼蘇達 (Minnesota) 州議員諾特遜 (Knutson)，必不發動去破壞商務協定計劃。

共和黨今日須表現其勇氣與智慧，準備應付未來之問題。外國頗憂慮在此次大戰之後，美國恢復獨立政策，正如上次大戰之後一樣，由於美國之關稅政策，驅使各國作經濟戰爭，訂立雙邊商務協定，施行外匯統制，入口限額，提高關稅，英國對此最感憂慮，因其以為經濟戰爭為獨裁政治之先聲。

共和黨領袖如魯斯 (Luce) 夫婦，猶德 (Walter H. Judd) 波爾 (Bell)，卡頓邦尼 (Kaltenborn) 基爾 (Muir) 等，曾向英外相貝文保證，謂貝文毋須憂慮去秋共和黨之勝利，因此勝利並非說明美國要恢復獨立主義。我本人歡迎此項保證，我更贊成一九二〇年有些著名共和黨員提出哈定 (Harding) 總統要引導美國加入國聯聯盟之保證。現在魯斯這批共和黨議員若想避免責難自己，則必須以全力誠意的阻止共和黨行孤立主義之路，以免破壞商務協定之計劃。我希望魯斯這批共和黨議員不致如羅拔斯之在一九二一年被人不重視。

第三，美國須供給相當資金予世界落後國家，以增加其農工業生產。若吾人着重於減低關稅及拓展世界商務，此種投資結果可獲利數倍，美

法國共產黨之潛勢力

戒庵譯

法國政局，實抱很大的隱憂，有幾個基本事實，使表面上政治的景色有同鬼魅不可捉摸，大家都視為忌諱，不敢說話，這些事實，是什麼呢？

第一、以最淺的意義言，法國已經失去了她國家的主權，即是說，她沒有保護她疆域的能力。從前馬奇諾防線是一種幻想，現在連這幻想都沒有了。一個國家，由一等國變成三等國，而於公眾的生活，人民的性格和心智，沒有深刻的影響，這在歷史上，還沒有先例，雅典失了權力的時候，還在繁榮，羅馬則凋喪以亡，在那兩條相反的道路中，因為變動的實際應深入於人民意識之中，而現在則還不到這種田地。

法蘭西之最迫切需要的，是精神的退隱。她要有幾年太平，把她的問題，再三思索，把她的新價值，拿來咀嚼和結晶，但是，還辦不到，一部分是因為經濟的情勢，而主要則因為有第二件的基本事實。

這第二件基本事實，就是今天在法國數目上最強的黨，公開承認它忠於外國，而這外國的利益和傳襲却與法國的相反，經過二千年來，拉丁傳襲的自豪和堡壘，已經變成比散普恩 Byanti 文化的優劣，因為假使法國受中國或墨西哥扶助的黨來統治，也是一樣成為悲劇的。

第三是一個法國人尚不敢正視的事實，就是

法國在內部也已經失去了主權，這個意味是指行政的首領不復有真正的權力來控制法國，說清楚一點，在共產黨控制下大權在握力量集中的工會，叫做 C.G.T. 的，一旦起來總罷工，法國政府將在權力上便不能維持幾日。

大家不要想錯，以為這和美國的工會及其部分的罷工，如礦山碼頭等罷工相類，在現在的情形之下，法國有一總罷工時，電力煤汽力要停止了，火車公共汽車也要不開了，電話要不通了，郵件要擱置了，整個城市都要餓死，生活會完全停頓和入於睡鄉一樣。

但控制這變大權力的 C.G.T.，在法國共產黨的大牌中，還不過是一張，雖然或許是最重要的一張，它那革命運動的地下活動，是用舊日陰謀的傳統，用新馬基維黎的哲學，把真正重要的權力因素，確實握住，而五百萬的選民，公開的宣布，和國會中的表演，則不適用來掩飾而已。

當德國政權崩潰，新政府還沒有接上的時候，共產黨的 FTP 把警察和共和衛隊中反共較著名之分子清除，做得甚為成功。從前由俄國或俄國控制之各國流亡在法國的著名人物，每星期約有一兩位不知去向，這在國外是很少人知的。

再者，在過去幾星期中，不獨外國的流亡人乃至本法國人，正在巴黎和近郊被人綁票，他們多是持異見的共產黨員，前時在大工廠中或鄉下，佔有中等的地位，而曉得的事太多的。

國現須積極減低賦稅，俾商業得以自由。若美國與世界繁榮所需之國際商業要大量發展，則不獨要在多瑙河建築 TVA 工程，且須在歐洲各國普遍建築，尤其中東，中國及非洲更需。此外，美國須在數年中投資十億元於今日世界最貧困之地方，以增加其農工業之生產力。

第四，共和黨佔優勢之國會若能抵抗以減稅之故而減少政務之企圖，則其對美國之服務甚好。今日減稅之唯一有效辦法是以和平方法與蘇聯訂立協定，並設立世界安全系統，以減少大量軍備。

第五，國會須承認勞資關係業已改善，聯合鋼鐵工會與美國鋼鐵公司之協調，便是一例。勞工立法若不採取懲罰手段，很有可能使勞資合作，以實現工業上之和平。現已有將向國會提出之激烈法案，若果然提出，其結果厥為增加罷工與減低生產而已。

第六，國會可助農民解決剩餘產品問題，農業調整方案，常備倉儲及糧食券計劃須再實施。若欲解決國際剩餘糧食問題，必須設立類似約翰·柯爾爵士 (Sir John Ott) 所倡議之世界糧食委員會。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共和黨對於農業問題，束手無策。農業行政能手如康薩斯 (Kansas) 州之哈甫 (Chillicothe) 對此問題最精。

若美國東部之共和黨議員執行哈甫之計劃，則可解決農業之困難。有些共和黨議員以為農業問題甚容易解決，補貼出口便得了，但從長計議，則此辦法是不堪設想的，世界糧食委員會之計劃很健全，若共和黨真有能幹，正在國務院要解決此問題時，當可不許其專美。

共和黨若能推行上述六項建議，余不勝快慰；但共和黨議員如何決定，余則不知，惟深信六百萬共和黨員必贊同我之意見。

